

《商颂》五篇的分类与作年

姚小鸥

《商颂》五篇的作年问题，在先秦时代本无歧议。汉代以后，《诗》说纷纭。荦荦大宗者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另尚有若干家为后世不传者^①。诸家持论不同，关于《商颂》五篇产生的年代也发生了歧说。或以为产生于商代，或以为产生于春秋。近代更有作于“宗周中叶”^②等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杨公骥、张松如两先生力主商代说，近年来渐取得学术界的承认^③。以上各说，皆以《商颂》五篇为一整体进行讨论，将其分类讨论者较少。

较早对《商颂》五篇就创作年代进行分类的是王夫之的《诗广传》。其分类的理由是：

汤放桀於南里，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传及于《长发》而韦、顾、昆吾与桀连类而举矣。率其凌蔑不恤之旨，汤殆以力争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颂契曰“桓拨”，颂相土曰“烈烈”，颂汤曰“莫我敢曷”，颂后王曰“勿予祸適”，颂武丁曰“挾彼殷武”，殆将暴六百祀之天下于桀日矣。呜呼！此不问而知其非商之旧也。词夸而不慚，音促而不舒，荡人以雄而无以养，斯宋之以徵殷而丧殷之徵者也。宋于是乎以世杀其宗臣，宋于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战，宋于是乎以不度而争楚于孟、泓，宋于是乎以射天笞地、剥滕吞薛、战齐、楚、魏

而速其亡。名之所传而言随之，言之所流而志随之，志之所竟而事随之，志成乎事而气应之。石为之陨，鹄为之退飞……上下交奖，天物交变，而殷先王之泽无有余矣。

王夫之由此而得出如下结论：

《长发》、《殷武》，宋之颂也。《那》、《玄鸟》、《烈祖》之仅存，不救其紊矣。^④

王夫之的《商颂》分类观点被近人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的《中国诗史》所采用。陆、冯两氏看出王氏以先后王之德之不同来分区《商颂》五篇，未合《商颂》思想内容之实际，于是另从其他方面搜寻其立论的根据。《中国诗史》说：

《商颂》“前三篇与后二篇的异点，实在太多。就内容方面说，《那》、《烈祖》与《玄鸟》显然是祭歌，……《长发》与《殷武》似无祭祀的意味，只叙商族的起源及宋人伐楚之事，大约是‘美盛德之形容’的祝颂之诗。”

《中国诗史》的这一论述有许多疑问。首先，从内容来看，《玄鸟》与《长发》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二者都是从商人的始祖讲起。《玄鸟》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是“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两诗的主要部分都是讲商先王征伐的伟业。《玄鸟》是“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而《长发》是“玄王桓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二者除篇幅长短有别外，从内容上怎么能看出一是祭祀而另一为祝颂？况且“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正是颂诗的特点，也正是颂之所以用于宗庙祭祀的地方。翻检先秦文献，这方面的证据甚多。如典型的“美盛德之形容”的“大武乐章”就是西周早期第一批用于祭祀祖先的乐歌^⑤。再说，该书认为《那》、《烈祖》及《玄鸟》近于《周颂》而“《长发》与《殷武》显然近于《二雅》”。“如此两两比较出《商颂》的年代，……都可以明了

了。”实际上，这一结论非常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该书所谓《商颂》的时代“可以明了”，指的是“前一类的时代似乎较早，不妨假定为前八世纪的诗；后类则较晚出，或者是前七世纪的诗”。这一说法不具有说服力。为什么类《周颂》的诗应作于西周末，而类《二雅》的应作于春秋初？难道其时正是二者分别流行的时间吗？翻开《诗经》，可以知道西周后半叶正是二《雅》创作的旺盛时期，而春秋初，正是周的天下开始分崩离析之时，哪里会流行什么“祝颂之诗”呢？更不要说该书作者承认自己并不能判断《商颂》的时代，只能取前人诸说加以调和了^⑥。

我们认为，在《商颂》五篇中，没有明显的理由将前四篇分开，而最后一篇《殷武》，则需加以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将《殷武》全篇引录如下：

一

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二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三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適，稼穡匪解。

四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五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六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是虔。松栢有桼，
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本篇首句，就有许多问题值得仔细研究。首先，如何解释“殷武”一词？《毛传》说：“殷武，殷王武丁也。”清人王先谦则认为“殷武，犹言宋武也”^⑦。鉴于王先谦同意魏源关于《商颂》是“宋襄作颂以美其父”，而宋襄公的父亲为宋桓公，按照春秋时期的习惯，只能被称为“宋桓”。所以，从逻辑上讲，王先谦在这里所说的“宋武”只能是指“宋国的武力”，不能是指宋襄公之父，而这种训释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故不可取。我们认为，“殷武”当指“殷”的某一位“武王”或“武公”。因为以国名加生称或谥号来称呼国君，是中国古代的通例。如“夏启”、“商汤”、“周武”、“郑庄”、“齐桓”、“晋文”，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么，诗篇中的这位“殷武”所指具体为谁？是否是殷王武丁呢？我们认为不是。究其原因，是因为下文有“奋伐荆楚”的内容。诗中并且明言此“荆楚”的方位是“居国南乡”的。考以楚国历史，此事与殷王武丁无缘。

楚国早期的历史，由于史书语焉未详，争论很大。这里仅根据本文需要，就一些比较确定的文献材料，结合考古成果，略述如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阳”（《楚世家》）。高阳氏的后代祝融氏，是活动在中原一带的部落。春秋时的郑国，是其故地（《左传·昭十七年》）。祝融之后，或说八支，即所谓祝融八姓（《国语·郑语》）；或说六支（《楚世家》）。但是都说楚人先祖季连为其中的一支。夏商时期，季连一支的活动情况不详。所以《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杨公骥先生曾指出，分布在卫地（今河南滑县考岸镇）曹地（今山东成武境内）和己氏国（河南）的三个楚丘，原是楚人故居，证明楚人曾活动在黄河两岸（《中国文学》487

页)。至迟到商代末年，楚族已迁居到丹阳（《世本》：鬻熊居丹阳）。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秦发兵击楚，“大破楚师于丹淅”的那个地方。丹淅之间是古代中原与关中交通的重要孔道之一，从此以后，楚开始与周发生密切关系。楚人的活动，又正式见于记载。《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就是说，从鬻熊时开始，楚与周建立臣服关系。到成王时，熊绎始被周封为诸侯。到成王以后，楚又被称为荆，或荆楚联言。这在西周金文中获证甚多。如：

才从王伐荆。（《才簠》）

过白（伯）从王伐反荆。（《过伯簠》）

夬御从王南征伐荆楚。（《夬御簠》）

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史墙盘》）

以上皆为著例。杨松骥先生认为，“荆是山名，周初，楚人战败后，曾退入荆山。楚灵王曾说：‘昔我先君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左传·昭七年》）因此，周人称楚为荆，意为‘荆山草莽中的人’。……称楚为荆是由于周人对楚的敌视，并不是楚在僖元年改了国号。”（《中国文学》487页）综上所述可知，“殷武”所伐，是周成王以后的楚国，而非武丁时期活动区域不详的楚族。前引《殷武》中的若干诗句，也不写作于商代，而必在周代成康之世或其后。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诗句写作于商代，确实是描写武丁伐楚之事，而后代传唱时误加“荆”字呢？这种可能性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因为诗中三次出现“荆”、“荆楚”字样。尤其“哀荆之旅”一句，“荆”字出现在句中，不涉及声韵或句式的任何技术问题。绝无对诗史进行改动的必要。

《殷武》一篇中说所征伐的荆楚当时“居国南乡”，这是一个

应予讨论的重要问题。学术界过去一般认为，武丁时期没有南征的记录，更不要说武丁之亲征了。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在谈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说：

武丁占辞常有“允有来雉自东（西、北）”的记录，乃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几乎没有证“来雉自南的”，郭沫若因此说“足见殷人南方无劲敌”（《卜辞通纂》549页）。但乙辛卜辞记征人方，乃用兵淮上的记录，只是武丁时之内侵不在南方而已。“武丁时代所征伐的方国，似在今豫北之西，沁阳之北，或汉河东郡、上党郡；易言之，此等方国皆在今山西南部，黄土高原的东边缘（晋南部分）与华北平原西边缘（豫北部分）的交接地带。”

《殷武》篇诗句中的“深入其阻，哀荆之旅”两句，暗示诗篇叙事的当时，楚已有相当大的国土面积。这与西周以前的楚人实力不相符合。许多材料证明，在武王克商以前，楚的力量还很小。《牧誓》所举参与伐纣的友邦冢君有“庸、蜀、羌、髳、卢、彭、濮人”，其中许多与楚人为邻。周人列举诸侯时，未列举楚人，显见楚是不重要的。另据《国语·晋语》，周成王在岐阳大会诸侯的时候，“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说明到那时，楚国显然仍是不受重视的小角色，足可证其国力不强。商周之际的楚国国土面积，史无确载，但肯定很小。《左传·昭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杜注》：“方百里为一同。”沈尹戌关于楚国国土面积之说，或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是楚国的高级贵族，就重大国家政策发表评论，且批评的又是当权的令尹，故所言与事实亦不能相去过远。又《史记·孔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言“楚王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可以与此互证。以此观之。如果说在商代伐楚时需要“深入

其阻”，真可以说是无的放矢了。

这里我们应该说清楚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商代，商王朝的统治势力及其文化影响所及，远达长江中游地区。这一事实对本论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地区在周代，尤其是在春秋时期及以后，是楚人的势力范围，而学术界的研究证明，武丁时期，商人曾有在这一地区用兵的记录。甲骨文及古史专家曾举出若干重要的证据。其中的一条重要卜辞是《掇续》62：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中比与（举），左比曾？

这一卜辞是所说的“立事于南”即在商的南土“莅事”。结合其他卜辞及金文材料，可知当时所“莅”之“事”即对南土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卜辞中所涉及的两个方国“与（举）”和“曾”是商朝南土的封国。其地域正在后世楚之中心地区汉水流域^⑧。

既然武丁时期商人曾在后来是楚的中心区域发动过较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那么是否就可以推翻我们在前面所作的论证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商人这次军事行动所打击的对象并不是楚，而是“虎方”。虎方是商代南土与商王朝为敌的重要方国。前引文还提到一组重要的青铜器，即公元1118年（北宋重和元年）在今湖北省安陆地方发现的“安州六器”的铭文记载了周初伐虎方的路程。这证明，一直到周初，活跃在汉水流域与中原王朝对立的主要并非楚人，而是虎方这一部族。

考古专家的研究还证明，商人在长江流域的重镇盘龙城，在早商文化二期以前，是商人在这一地域的区域性的控制中心。而在早商文化三期末段以后，商人已将盘龙城放弃。这暗示了这一时期商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有所减弱^⑨。这些历史事实启发我们注意到，虎方在商代及商周之际活跃于汉水流域，在商代，它是商人在该地区的大敌，正如楚人在周代逐渐成为周人的头号对手

一样。虎方的活动与商周之交及周初楚人对周人所表现的臣服也大有关系，它还使我们认识到，楚人崛起于汉水流域，是伴随着虎方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这一先秦时期部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

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殷武》中谈到的所伐之楚绝非商代可能还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楚人；伐楚时间不在殷商时期而必在西周成、康之世或其后，很可能在西周中叶楚的力量渐积而和中原王朝势必冲突之时。如此则“殷武”不指武丁或任何一位商王。当此名号者就只有宋国国君宋武公了（“宋”可称“殷”，已为常识，兹不详论）。

“殷武”指宋武公，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的《殷武》篇解題中已有此议。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惟宋武公立于周平王六年，而《诗经今注》中写作立于周宣王六年，当是一时笔误。宋武公伐楚，史书阙载。但我们知道，与《商颂》关系很深的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世。戴公当周宣王时，正是周人疆理南国之时。《殷武》所述，是否包括宋武公在戴公时的某些勋业，不得而知。顺便说一下，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以为商人自称商，而周人称之为殷。系出于敌忾^⑩。但孔子自称殷人。1978年发现的宋景公所作铜器，“铭文中景公自称‘有殷天乙唐（汤）孙’”可证称殷并非卑称^⑪。

对《殷武》一篇的性质内容，我们作如下分析。本篇是宋国新修宗庙落成典礼上所唱的颂歌。其中既有歌颂先祖功德的内容，也有时王向先祖告成武功的内容。两者相加，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语）。

《殷武》中所述先祖事迹，必系从殷人传统颂歌中撷取，故其文辞高古，颇存殷商时的成语。其史迹也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商史相合（比如强调“氐羌”为殷人的主要敌人，即与甲骨文的记载相一致）。

从《殷武》一诗的篇章组织结构来说，也可见前述新作与旧著组合的痕迹。全篇可分为三个部分。首章至二章之“居国南乡”为第一部分；自二章“昔有成汤”至五章为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为第六章。其中，第一和第三两部分可能为新作，而第二部分则为旧作之改造。故其在精神、风格上与《商颂》他篇尚无大异。这是前人忽略它们之间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殷武》之外的《商颂》四篇，我们认为当传自殷商时代，并基本保持了原貌。

我们之所以说“基本”保持原貌，是因为在这些诗篇中，屡屡出现了“天”、“天命”等字样。陈梦家先生应用卜辞材料，指出商周两代天帝观念的异同。他说：“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殷墟卜辞综述》581页）“天、天命和天子的观念，是到了西周才出现的。”（同上书646页）这种为学术界所普遍承认的文化现象（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说明《商颂》传至西周末年曾有小的改动。除此之外，在这四篇《商颂》的内容中，就很难确指有殷代以后的成分了。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前代制度往往在后世得以保存，留有痕迹。本文所述事实是较早的例证。历代正史礼乐志中的颂歌多撷取前代乐歌加以改造，如汉代乐府所造歌诗所示，即其子遗。可见这一现象具有较为普遍的文化意义。

注：

①《汉书·艺文志》载《齐诗》有“后氏”、“孙氏”之别，阜阳汉简所见《诗经》残简与今存各家均有较大差别。学者以为属“四家诗”之外，或为所谓《楚元王诗》。

②王国维：《说商颂下》，《观堂集林》卷二。

③杨公骥：《商颂考》，《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松如：《商颂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④《诗广传》173—17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⑤参见姚畋（姚小鸥）：《论大武乐章》，《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
- ⑥《中国诗史》27—2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 ⑧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 ⑨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⑩郭沫若：《奴隶制时代》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264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2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广播学院